

「思想事件」的修辞

鸡鸣丛书

王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鸡鸣丛书

「思想事件」的修辞

王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985 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

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事件”的修辞/王尧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鸡鸣丛书.第2辑)

ISBN 978-7-02-006728-2

I. 思…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808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印制:王景林

“思想事件”的修辞

Si Xiang Shi Jian De Xiu Ci

王 尧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6728-2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董 健

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鸡鸣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又出版第二辑共十种。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为什么这么说呢?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三江之后是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始)、南京高师(1915年始),再接下来就是东南大学(1921年始)、国立中央大学(1927年始)、南京大学

(1949年始),悠悠百年,延绵不断,这座鸡鸣山就是学术高地的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也与中央大学为邻,紧靠在鸡鸣山的怀抱里。即使是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最腐败不堪的年头,大学和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和精神的高地也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整个社会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清流,抗拒着滚滚而来的社会浊浪。1948年鸡鸣山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作为一个体制化行为而高度体现了政治上的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颇为乐道的一段佳话。当时选出的院士,人文组二十八人个个都是学界巨子,即使在政治上为当局所不满的左翼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之辈,亦名列其中,而有些颇得官方赏识的学者却名落孙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的权威由是而立。显然,建立学术高地,不仅要严防社会腐败之风(目前此风正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对学术界的侵袭,而且要时时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对此,我们有颇多的感慨与期待,同时也是怀有信心的。

其次,看中“鸡鸣”这个名字,还因为鸡鸣山上有座鸡鸣寺,鸡鸣寺里有座豁蒙楼。古寺的晨钟暮鼓,往高处讲,自然可以引出一些有关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话题,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这豁蒙楼,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有些警戒的意义。豁蒙之义与启蒙相通。中国人吃尽了受蒙蔽之苦,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说“五四”启蒙早已过时。然而看看近十多年的文学界吧,譬如,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竟然出面捍卫“样板戏”里的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这种种怪现状不都在说明着未经启蒙的精神蒙昧吗?我们的文学研究难道对此能漠然视之吗?

豁蒙楼是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

变法失败六年之后，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修建的。杨锐为政治改革触怒专制主义而掉了脑袋。张之洞重游鸡鸣寺，忆起甲午中日战起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阽危而痛叹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咏杜甫“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起楼，并亲笔题“豁蒙楼”匾额。看来，一切有点求新、求变头脑的人都有一种反蒙蔽的焦灼感。豁蒙者，解蔽也。看清了遮盖、蒙蔽之物而将其揭去，叫人心明眼亮起来。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譬如在鸡鸣寺建此楼之时，为了登楼远望，一览湖光山色，张之洞要求尽伐近边的丛木，这就是给自然景观除去了遮蔽。精神上的豁蒙当然是更加困难的。中国古人讲“正心”、“明道”、“解惑”、“劝学”、“致良知”等等，多少也有些精神豁蒙的意思在，但在那个专制主义文化的大框架之内，所谓豁蒙往往转来转去又变成了新的蒙蔽。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就说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我们至今还记得，人一犯错误就检讨说受了蒙蔽，然后被“代表正确”的人教导一番，“心明眼亮”地去“战斗”，但不久就又有新一轮的“正确者”来宣布你再一次受了蒙蔽。清华大学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何以至此？等到“文革”噩梦一醒，才知道当时全民都处在一个精神蒙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精神上的豁蒙，现在叫启蒙(enlightenment)，这是从 18 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才开始的事。在中国，五四启蒙打开了人的思想、精神的新境界，是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是，老的“左派”说，启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已被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所取代，现在再讲启蒙，就要“启”出反党的思想；“新左派”则说，启蒙是西方来的“殖民话语”（按：此言本身倒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殖民话语),要捍卫我民族独立性,应拒之国门之外。马克思主义只能吸纳、包容而不可能颠覆、取代启蒙主义。有些新派论者以“审美现代性”否定“资产阶级现代性”中的启蒙精神,也是很片面的。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凡此种种,中外先贤多有系统阐述,虽是老生常谈,至少在中国却并未过时。凡此种种,关乎民生、自由之制度建设,均为人类共同与共通的追求,早已超越了阶级与国度,没有什么你强加于我、我强加于你的问题。这里用得上孙中山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文学拒绝启蒙,便不出政治工具与庸人玩物两途,这当然是我辈同仁所高度警惕的。至今还有不少入将“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去政治化”与“反启蒙”作为一件事。岂不知有些政治行为本身,如果它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它就必然是以蒙蔽人民为前提的。

在此,“鸡鸣”之称中的一个“鸣”字,至今仍不失其对文人学子的一种莫可名状的诱惑力。吾辈既为文人学子,便不可不思;思而有得,便不可不鸣;鸣而遇到不同之见或受权威压制,便不可不进而争、进而再鸣。如此往复无已,学术便得到发展。1957年“大鸣大放”虽然吃了苦,但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短暂的学术春天所显示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气。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环境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宽松得多了,“多元化”的口号也叫得颇为响亮,但总也形不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鸡零狗碎、庸俗不堪、充满广告味的“热点”(如文学界为所谓“名誉权”打官司之类)倒是不断出现,也

时有某某领域某某人有某某“新说”、某某“新论”的报道,但多为炒作,认真严肃的学术争鸣却是没有的。归根结底,这是学术界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的萎缩所致。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alternative)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话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贯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又如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再造,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则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相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比如,现在讲“民族性”、“民族精神”很时髦,但很少有人从鲁迅、胡适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揭示“民族性”、“民族精神”之反现代性的巨大负面影响。只顾顺着“国情”、“中国特色”去讲,所谓“中国化”就往往不是化向新、化向现代,而是化向旧、化向前现代、反现代,就像鲁迅所说的:“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深度争鸣的缺失,还因为我们往往在貌似“多元化”的众声喧哗中,找不准价值的定位。主张“多元化”,提倡学术上互相宽容与尊重,决不意味着无比较、无权衡、无轩轻、无选择。面对互相对立的思潮与倾向,不偏不倚而“执中”就行了吗?孟夫子说得很明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讲的这个“权”字非常重要。权就是秤锤,没有它,你无以知轻重。所以孟子认为,没有权衡的“执中”仍

是片面的、偏于一端的“执一”。现在有些貌似很“公允”、很“折中”的理论,其实是很褊狭的。褊狭之风与浮躁心情有关。孟子在讲到无“权”之害时,举了个生动的比喻: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人,别看他吃喝得津津有味,但其实他是得不到“饮食之正”的,因为口腹的“饥渴之害”使他不暇掂量、选择,不能沉着、从容地做事。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后现代”的鼓吹者,有时就会露出这种“吃相”来。这样吃,就难免从垃圾里吃出“美味”——比如,从“文革”里品出“民主意识”,从“样板戏”里品出“后现代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既有价值定位又不定于一尊的深度争鸣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与研究,说到底就是苦心孤诣地把那么一点“思”、一些“感”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言说”(discourse)。说什么?怎么说?这是言说水平的问题;向谁说?听谁说?这是言说对象的问题。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浅,言之所形有是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说之难吧——晋朝有个叫宋处宗的人,家养一只会说人话的长鸣鸡。这位宋先生就是在与鸡的对谈当中“言功大进”,即大大提高了言说的水平。故而古人著书立说多称“鸡谈”、“鸡谭”云云。这个故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幽明录》,那时的人看重言谈之功,才会编出这么一说。鸡当然是不可能说人话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说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说明言说对象之难以到位的困惑与无奈。与其对牛弹琴,不如沉默与独语。与通人语的鸡对谈不是比与不通情理的人对谈更有益吗?我们的“鸡鸣丛书”当然面临着当代世界的言说之难。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听谁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矩。这些概念和规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如今,必须对它们

一一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当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会在困难之中言说出新的水平来,这样,也就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

2007年6月22日改定

目 录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1
“简单中断”与“历史联系”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之一	12
思想历程的转换与主流话语的生产	
——关于“文革文学”的一个侧面研究	22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39
一九八五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	
——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	50
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双向激活	
——和韩少功的对话	72
“思想事件”的修辞	
——关于王安忆《启蒙时代》的阅读笔记	94
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文学史的盲点出发	
——阎连科小说及其相关问题	112
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	140
“与永恒拔河”的人	
——隔岸妄论余光中	157

“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

——再论汪曾祺散文 168

重读“陈奂生系列小说”札记 178

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

——关于《赵树理罪恶史》的阅读札记 186

禁锢、开放、“技术处理”与历史的过渡 192

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 197

“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 202

争论的背后 207

传递生命的疼痛 210

在文化转型中重新出发 213

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 219

《山南水北》与“新寻根文学” 222

对话、整合与转型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序 225

后记 229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①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二〇〇六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我们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九十

^① 在20世纪尚未结束时,我们通常会说“八十年代”和“80年代”,新世纪后又通常会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或者“1980年代”,为了叙述的方便统一和尊重约定俗成的习惯,本文通称为“八十年代”。

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重返八十年代”的明确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①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一九九九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②,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含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

① 如程光炜的系列论文以及他和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等。有些论文,虽未明确说是“重返八十年代”,但对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演变等论述深刻透辟,如南帆的《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蔡翔的《何谓“纯文学”》、《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等。

② 韩少功在这篇访谈录中对八十年代启蒙中思维的简单化等问题多有反思,在这前后,韩少功的一些思想随笔以及他与笔者的对话录等对八十年代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有新的见解。

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终结“新时期”的命名。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八十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八十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

我们通常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阐释“新时期”与“文革”的关系的。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述中,“文革”始终是一个显现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因此而有“拨乱反正”,也是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的根据。于是,“八十年代”作为文学史的“断代”意义也即彰显出来。这样的论述经由对“文革文学”的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贯穿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搁置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种“断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研究,包括“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与“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关联研究,都有鲜明的意识而且富有成果。但是关于

“文革”和“新时期”的关联研究却始终没有深入下去,因此,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文学是如何从“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文革”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挖掘积极的因素来论述“新时期”到来的必然性以及历史断裂中的进步力量。比如,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反抗,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等都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这些论述虽然未必都是着眼于我所说的“关联”研究,但多少弥补了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断裂”。

因此,在我们的视野和叙述中,八十年代文学的“新”是和此前的文学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路径,用南帆的话说,“人道主义、主体、自我、内心生活是文学理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通道”。^①这条通道如果用简单的概念来加以描述,那就是“纯文学”,“纯文学”集纳了八十年代文学的最基本方面。在今天的种种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论述虽然不尽相同,但从“纯文学”的概念出发选择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是相同的尺度。因此,对“纯文学”的反思,实际上即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及前后相关问题的反思。^②围绕“纯文学”,我们可以牵扯出更多相关、类似的概念:人性、个人主义、形式、新启蒙、现代派、先锋、寻根、知识分子、精英等。在这样的通道之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有许多我们过去耳熟能详并且是我们思想生活、审美活动中的许多概念和词语被搁置甚至被遗忘了:革命、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化、工农兵创作、样板戏、史诗等。这样的状况,事实上也包含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激进

① 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② 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可以视为“重返八十年代”,而且是一次深度重返。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以及蔡翔在《何谓“纯文学”》中已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我这里就不再赘言。

主义革命话语与纯文学。

在今天的语境和知识谱系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当年以及在后来一段时期里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处理过于简单了。纯文学的历史不仅不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全部,纯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也非文学史论述中的那样单纯;同样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已经无法对八十年代文学做贯穿到底的概括,而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因为纯文学的胜利而被搁置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又重新抬头。发展的路径不同,但问题的基本面仍然在那里: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文化、文学体制、阶级和阶层、世界观、宏大叙事、工农兵写作、知识分子与大众等又以旧貌新颜和我们遭遇。毫无疑问,八十年代延续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中,但这只能是笼统的说法。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是共同的记忆,但不可否认,每个人的经验是有差异的,与其说我们仍然生活在八十年代,毋宁说我们生活在关于八十年代的纪实与虚构之中。当我们和那些死而复生的问题再次遭遇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八十年代和我们的想象并不一致。

巨大的落差在九十年代的变化之中。张旭东在为《幻想的秩序》所做的自序《重返80年代》一文,有比较多的篇幅是在谈“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关系。“‘80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则’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因此他有一个“信念”：“90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罪。”这个理想的状态是：“如果80年代西学讨论为某种隐晦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那么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题中之义就是:通过对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细致分析去破除思想氛围的幻想性和神话色彩,从而为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性出场及